引 言

由于纷繁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尤其是“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等都被迫害致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受牵连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得以解脱。此举体现出党的信心和勇气,获得广泛的赞誉。

然而,这些冤假错案的阴影短时间难以消除,其中的沉痛教训更是值得永远记取的,这就需要了解它们是怎么一回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目标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

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了两把火 第一把火烧罗明,第二把火烧邓、毛、谢、古。而根本的原因,即是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毛派”,整他们,就是整毛泽东。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第一把火就是烧罗明

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紧张。

1932 年 11 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大特务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专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目标。

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每天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汇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阳台上放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就表明是安全的，可进入联系。

然而，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被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这时，王明已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又去了苏区。于是，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与张闻天。

不久，博古从上海消失，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 年初，张闻天出现在红都瑞金。几天后，博古、陈云也来到那里。他们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红都。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他一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即迁入瑞金。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没

有存在意义。开初，二者并存，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 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 ”。

至 1933 年 6 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 ” 字样自然取消了。于是，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消失。 26 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即，博古看中瑞金城西沙洲坝下脊村一幢杨姓住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而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新官上任三把火。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罗明。

在中共党史上，凡被称为“ ××路线 ” 者，其代表人物一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像“ 立三路线 ”“ 王明路线 ” 等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博古一来到中央苏区，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在中共党内根本就不出名的“ 罗明路线 ”。

博古盯住了罗明

罗明，又叫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 年生，1925 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与组织农民斗争工作。 1927 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 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1928 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1928 年 11 月，罗明到莫斯科出席中共“ 六大 ”，回国后，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29 年 3 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

“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

当时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

1931 年 1 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与罗明谈了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还没提出“罗明路线”。

1932 年 4 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罗明到了前线，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从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总兵力当时仅 5000 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十九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在住院，毛泽东要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等，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从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指责。扩大会于 1932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没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击”，没起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与苏维埃政府都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对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于 10 月 20 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宝,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

10 月 31 日，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省委书记罗明与省苏主席张鼎丞，虽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然从实际出发。

1 月 21 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表达了他的认识：

省委：

依据敌人大举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连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要

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在上下层讨论，第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的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使地方武装不断地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罗明写好意见书后便到了上杭县，在那里，他领导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的敌人。

这时，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立足，只好迁往江西瑞金。

博古、洛甫等在去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和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就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便把同毛泽东会面的情形以及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形说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

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当根据中央苏区政府与军委会去年 4 月 14 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与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也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人走后，罗明等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但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

几天后，罗明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好执行，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送到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罗明只好改变策略，仍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他召集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几个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及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参会人员都认为应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边县边区。当晚，罗明赶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 有许

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在报告中他还尖锐地提出：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的报告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等人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与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 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 头晕，找不到头绪，因此，这些组织不能 健全起来而 是一种空拓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 减少或合并。 ……名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煅 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也是党章允许的，但由于他们没把博古等人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惹恼了他们。

博古等人看了报告后，大发雷霆，立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闽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派员到省委后，也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断定闽粤赣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于是，反“罗明路线”斗争便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罗明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对此一无所知。

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

几日后，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到汀州途中，遇到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问张：“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急道：“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围剿’怎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扩大？”稍停他又说：“我们并不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与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去瑞金的通知，于是又赶到了瑞金，被安排在叶坪中央局的一间屋里，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罗明被软禁了。

第二天，中央局的几个干部与他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接着，一位中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到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解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随时与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进攻。因此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分批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了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这时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说到此，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之后，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做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随即博古眼睛一斜，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晚，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近 100 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大会气氛紧张，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这时，罗明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架到主席台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气氛才平和了下来。

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

中央局给‘罗明路线’,定了性

2 月 15 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后，同样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当日，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 （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

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从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就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以批驳。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博古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

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

博古最后说：“为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博古在大会上还严厉批评了闽粤赣省委的主要领导。他以手拍桌,大声说“:对于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只是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的错误，温和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也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讲到这里，他声音嘶哑地喊道：“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也有着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使命！”

2月 24 日，闽粤赣省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也派人参加了，省委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内容是批判“罗明路线”。

首先由罗明做检查，给自己“上纲上线”一番。

接着，与会代表对罗明路线展开批判。“风派人物”们都顺着中央定的调子把罗明骂了一通。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不然新泉根据地不能巩固。”

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多是工农干部，敢说真话，他们讲了罗明领导的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好处。还说若各区乡都这样做，能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当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到每当敌人进攻，由于对敌人的地点、兵力等都估计得很准，因此每仗必胜时，中央代表很不高兴地插话说：“这都是一般参谋人员的事，不是你们区乡干部的工作。”

代表大会越开越紧张，到后来，竟采用谩骂及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指着张鼎丞说：“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但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

在会上，罗明、张鼎丞、刘晓等人，被迫在大会上做了检查，但中央代表和一部分“风派人物”仍对罗明等人的检查不满意。

最后，临时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及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定，并宣布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

这次会议还改组了省委，由陈昌寿担任省委书记。

会后不久，罗明与杨文仲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刘晓调到江西，张鼎丞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

“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闽粤赣省批判“罗明路线”达到了高潮，当时，闽粤赣苏区抓“社党”的恐怖犹在，反“罗明路线”运动又起，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许多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怕引火烧身。

这场运动的结果，不但使闽粤赣省的主要干部遭到了打击，甚至所有地方的区、军队的连以上干部都被斗过。并且打击一个提拔一个。

罗明等被撤职后，省委常委、军区司令谭震林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打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

一时之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把闽西的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在肃“社党”中幸存下来的少数老干部，也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也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

各级干部在肃“社党”时的恐怖心理，这时又起：当时不少人认为“罗明路线”就是“反革命”，罗明就是反革命分子。许多和罗明熟识的人不敢和他来往，也不敢和犯了“罗明路线”的人来往。

反“罗明路线”一直持续到主力红军长征才缓和下来，但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50 年，杨尚昆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看到一个 50 多岁的高个子，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那人见状，立即上前握

住杨尚昆的手说:"我就是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你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谁也不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博古的第二把火烧邓、毛、谢、古

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的第二把"火",便是烧"江西的罗明路线一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一生历经"三起三落"。此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第一次"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两次"落"。

1931年夏,邓小平奉命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开始,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到闽西巡视。8月,他和爱人金维映(阿金)奉命由闽西赶到瑞金,当时担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维俊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那时的瑞金,正处在一片混乱中。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与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那里大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全县有2000多人被错杀,其中县委、县苏维埃、县工会有80%的干部被处死,连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也被作为"社会民主党"而杀害。

邓小平一到瑞金,在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后,立即下令拘捕了李添富、谢在权。

9月,邓小平在瑞金主持召开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处决了李、谢二人,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这深得瑞金干部群众拥护,也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支持。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